

唐代渤海国聘日使节诗歌初论^{〔*〕}

○ 沈文凡, 李 莹

(吉林大学 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唐代渤海国文学是东北民族文化与中原精英文化融合下的产物,具有清晰的民族心脉。渤海国传世的诗歌均为聘日使节的作品,它们深受六朝和唐代诗歌的影响,在渤海国聘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渤海国聘日使节诗歌经历了从外交赋诗到文人雅集的发展历程,呈现出从政治应酬到私人抒情的态度变化,渤海国大使裴頔与日本文臣群体的“鸿胪馆赠答诗”成为诗坛佳话。聘日使节杨泰师、王孝廉、释仁贞和释贞素等人的诗歌在主题及艺术表现方式上具有较为独特的特征。渤海国聘日使节的诗歌彰显了国家的文治成就,在东亚汉诗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关键词〕渤海国;日本;使节;诗歌

唐代的营州地区是中央王朝经略东北的要地,同时亦是东北亚各民族挺进中原的必经之路之一。万岁通天元年(696),营州都督赵文翊因肆意欺凌治下少数民族引发契丹等部族的不满,酿成“营州之乱”。粟末靺鞨首领乞四比羽和乞乞仲象借此机会东渡辽河,企图重归肃慎故地。在粟末靺鞨与唐朝军队的对抗中,乞四比羽阵亡沙场,乞乞仲象病逝归途,乞乞仲象之子大祚荣脱颖而出。他收揽四散的部众,在天门岭大败唐军,此后因契丹、奚等民族归附突厥,从而隔绝了唐朝追讨粟末靺鞨的通路,复杂的民族形势为渤海国建国提供了良机。唐圣历元年(698),大祚荣以“震”为名,建立政权,先天二年(713),他接受唐朝正

作者简介:沈文凡(1960—),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李莹(1980—),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唐诗》创作接受史文献辑考”(编号:14BZW082)、吉林大学2013年度本科教学改革研究立项项目“中国韵文学通变史”(编号:2013059)研究成果。

式册封,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领忽汗州都督。自此这个唐朝地方政权以“渤海国”为名,成为唐朝的东北屏藩,有“海东盛国”之美誉。

渤海国将中原优势文化引进东北边疆,融合了民族和地域的特质,将其化为渤海国文学的精魂。随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建立,渤海国在完成了向文官政府的转变之后,多次派出才华出众的文臣担任聘日使节。渤海国使节的精神气度和文化修养赢得了日本朝野的尊敬,在外交往来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彰显出国家的文治成就,促进了渤、日关系的稳定发展。日本派出具有较高文学造诣的文臣接待渤海国使团,两国大臣诗歌唱和,交往频繁。现今,大部分渤海国诗歌文献随着渤海国政权的瓦解而散佚,仅有 9 首渤海国聘日使节的汉诗作品因收入日本古籍而存世,另有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收录的 48 首日本诗人与渤海国使节的唱和之作与之相互呼应,它们都是渤海国诗歌研究的珍贵资料。

一、沧波织路,敦使聘邻——渤海国使节诗歌背景论

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考量,渤海国仁安八年(727),日本神龟四年,渤海国王大武艺首次派遣宁远将军、郎将高仁率领 24 人的使团,携带国书和礼物访问日本。日本天皇面对渤海国的示好,给予了热切的回应,并对渤海国进行回访。自此,长达二百余年的渤、日通聘历史正式拉开序幕。

渤、日通聘始于双方的政治野心,两国外交关系的形成是各方利益互相牵制和平衡之下的结果:唐玄宗时期,唐朝对于东北边疆的掌控日渐增强,渤海国王大武艺在政权稳定之后试图反抗唐朝统治,拓展势力范围;渤海国是日本与唐朝之间的重要交通线,日本企图以渤海国为跳板,扩大在东亚的影响力;新罗与唐朝交往密切,与渤海国和日本的关系则极为冷淡。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下,渤海国和日本开启了外交往来,以争取各自的国家利益。虽然两国开展了正式的外交往来,但是二者的政治诉求并不完全一致,曾因相应的礼仪和国书等问题产生矛盾,究其核心正是如何定义两国关系。渤海国坚持自主和平等的外交,不肯臣服日本,只愿在枝节问题上作出一定的妥协。面对日方的要求,它采取灵活的外交策略安抚日本;每逢日本君主更替必致以国书;开展官方的贸易活动;为日本使团提供赴唐通路并传递物品和信息;聘日使节与日本君臣诗歌唱和等等。渤海国以务实的外交手段稳定两国关系,促进了双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层面的交流与合作。日本企图迫使渤海国承认其上国地位,但在渤海国拒绝之时又能保持着较为友好的态度以延续两国往来,甚至在敕撰汉诗集中收录渤海国聘日使节的诗作。

日本古籍收录的渤海国聘日使节诗歌是符合编纂者审美心理的作品。《文华秀丽集》收录了王孝廉诗 5 首,释仁贞诗 1 首,《经国集》收录了杨泰师诗歌 2 首。《文华秀丽集》和《经国集》是平安时代以日本朝臣为创作主体的汉诗文集,以应制和唱和之作为主,意在尊崇天皇权威,扩大国家政治影响。《文华秀丽集》“编次袭用《文选体例》,分游览、宴集、饯别、赠答等十一类。”^[1]仲雄王《文

《华秀丽集序》云：“凤掖宸章，龙闱令制，别降纶旨。俯同缥帙，而天尊地卑，君唱臣和，故略作者之数，编采摭之中。臣谬以散材，忝侍论简，重承天渥，虔制兹序。”^[2]这部诗集遵循萧统《文选》的诗歌分类方法，主要收录君臣唱和之作。《经国集》之名取自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3]。滋野贞主在《经国集序》中有云：“冀映日月而长悬，争鬼神而将奥，先入《秀丽》者，即不刊之书也。彼所漏脱，今用兼收。人以爵分，文以类聚。然年代远近，人文存亡，搜而未尽，阙而俟后。”^[4]两部古籍中的汉诗都以歌功颂德为主题，贴近六朝和唐代的诗歌审美心理。不同之处在于，《文华秀丽集》以文辞取胜，且以唱和诗为主，因此王孝廉和释仁贞传世的作品均为唱和之作。日本古籍的选诗标准决定了入选的渤海国诗歌的内容风格。因此，渤海国存世的聘日使节诗歌多为以六朝和唐代诗歌为模仿对象的文辞优美的颂圣酬赠之作。渤海国聘日使节诗歌中展现出的温文尔雅的风度和颂圣酬赠的主题是它们能够入选日本诗集的前提。这类诗歌应该只是渤海国诗歌风貌的某一侧面。

渤、日通聘赠答诗是渤海国使节访问日本期间与日本君臣之间酬赠应和的诗作。这类诗歌在文学交往中展现了两国的政治姿态、文艺修养、审美心理和诗友情谊。受到诗人能力和创作氛围的限制，渤海国聘日使节诗歌的境界和题材都较为平庸。创作主体和受众的特定性使得诗歌多为颂圣宴饮、友情酬赠和羁旅乡愁之作，只有杨泰师的思乡夜曲和释贞素的伤悼之歌展现了个性化的情怀。聘日使节的诗歌在有限的篇幅中体现了渤海国对于唐朝文化的仰慕和学习热情，展现了唐代东北藩国的文学实力。渤海国大钦茂、大言义、大玄锡时代，大量的中原文史典籍和诗集传入渤海国，渤海国诗人对于诗歌韵律技巧的把握更为纯熟。《渤海国志长编·族俗考》云：

聘日本诸臣如杨承庆、杨泰师、王孝廉、周元伯、杨成规、裴頔及其子璆，皆以文酒唱酬，才长应对，为所引重。而擅长雕刻、绘画者，亦有之。此皆渤海濡染唐风之证也。^[5]

据此可知，渤海国诗人亲近唐朝文化，在诗酒酬赠的环境下创作出优美的汉诗，涌现出知名的诗人如杨泰师、王孝廉、裴頔、裴璆等人。聘日使节诗歌的创作环境和作家身份决定了作品的功用，凸显了它的交际功能。诗以类聚，人以群分，有着相近身份背景和汉学修养的两国文臣诗歌唱和，形成了互动式和群体性的诗歌创作方式。

渤海国文王大钦茂时期，杨泰师是渤海国使节诗人中的早行者。渤海国大兴二十一年(758)，日本天平宝字二年，日本正使小野田守，副使高桥老麻吕率领使团访问渤海国，渤海国派遣辅国大将军杨承庆为正使，归德将军杨泰师为副使，率领23人的使团回访日本，吊圣武天皇之丧。此次聘日正逢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滞留中土。渤海国使团向日本通报了唐朝的情况，同意日方取道渤海国迎回藤原。在这次访日期间，以武将身份出使日本的杨泰师展现出杰出的诗歌才华。

渤海国诗人王孝廉在日本亦曾赢得良好的声誉,他是渤海国中期的文臣诗人代表。《渤海国志长编·诸臣列传》称:

王孝廉,任于僖王之世,官太守。朱雀二年秋,奉使聘于日本,高景秀为之副,告定王之丧。九月,舟至出云登陆。十二月,入日京,呈国书。三年正月,日皇宴之,奏踏歌,授孝廉从三位,……五月,孝廉等乘船返,海中遇风,漂著越前,孝廉遂成疾。六月,孝廉卒。日本赠正三位,以丧还。孝廉之在日本,与僧空海以诗唱和,及其卒也,空海致书孝廉之记室慰问之。^[6]

王孝廉以敏捷的才思和纯熟的诗法赢得了日本君臣的一致赞誉,成为存诗最多的渤海国诗人。他的随行录事释仁贞,原姓大氏,本系渤海王族,以佛门弟子的身份担任渤海国使团官员,展现了渤海国僧人的汉学修养。渤海国朱雀三年(815),日本弘仁六年,渤海国使团顺利完成出访使命,从敦贺港(现福井县敦贺市)返国。五月十八日,渤海国航船遭遇海上风暴。五月二十三日,渤海一行漂流至日本的越前国(今福井县东南部)。六月十四日,王孝廉因疮伤病逝日本,不久之后,释仁贞亦故去。对于王孝廉的意外身亡,日本天皇颁诏表彰他的功绩,日本僧人空海有诗文寄托哀思。

渤海国另一位文化僧人释贞素奔波于大唐、渤海和日本之间,用生命谱写了中日僧人间的深厚交谊。渤海国朱雀元年(813),日本弘仁四年的秋天,释贞素作为渤海国精通汉文和梵文的学问僧人入唐参与唐朝的佛经翻译工作。他与日本高僧灵仙三藏言道相合,遂拜灵仙为师。渤海国建兴五年(822),日本弘仁十三年,灵仙到五台山求法,贞素居于长安。渤海国建兴七年(825),日本天长二年,日本天皇赐给灵仙黄金,由贞素送至五台山,又受灵仙之托将一万粒舍利、新经两部、造敕五通等送至日本,贞素返回渤海国,随高承祖使团出使日本。渤海国建兴九年(827),日本天长四年,贞素带着日本天皇再致灵仙的黄金和书信随渤海国遣唐使入唐,却惊闻灵仙过世的消息,写有悼念灵仙的诗歌。释贞素奔走于渤海国、唐朝和日本之间,最终他在赴日传信途中遭遇海难身亡。在渤海国聘日的海上丝路上,以王孝廉、释仁贞、释贞素为代表的渤海国使节以生命为代价,在东亚文学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

渤海国最负盛名的诗人是裴頌和裴璆父子,二人都曾以文籍院少监身份担任渤海国大使,多次出访日本。渤海国大玄锡十一年(882),日本元庆六年,裴頌率团出访日本,他的清新的诗风给日本文坛带来了巨大的震动,赢得了空前的赞誉。日本诗人纪长谷雄和菅原道真等人对其推崇备至,与之唱和,并将相互酬赠的59首诗歌辑为“鸿胪赠答诗”,传为一时的佳话。渤海国末王大諲撰元年(907),日本延喜八年,裴璆首次出访日本即受到天皇和文臣的热情接待。大諲撰十三年(919),日本延喜二十年,裴璆第二次访日,将裴氏父子的诗名推向了顶峰。日本诗集《扶桑集》收录多首日本诗人与裴璆的唱和之作。渤海国灭亡之后,裴璆出任东丹国官职,于东丹国甘露四年(929),日本延长七年,以东丹使节身份第三次出访日本。此次聘日以失败而告终,日本天皇拒绝接见东丹国使

团,并遣责裴璆朝秦暮楚。裴璆为此呈上《谢状》一篇,以表愧疚之情,但仍未能挽回日方的好感。裴氏父子的诗作未被日本古籍收录,应与裴璆之行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渤海国聘日使节的诗歌创作逐渐从严肃的外交应酬转向闲适的文人雅集,体现了两国外交关系的逐步稳定,展示了两国文臣对于汉诗的创作热情。渤海国大兴二十一年(758),日本天平宝字二年,杨泰师有《夜听捣衣歌》和《奉和纪朝臣公咏雪诗》传世。渤海国朱雀二年(814),日本弘仁五年,王孝廉创作了《奉敕陪内宴》《春日对雨得情字》《在边亭赋得山花戏寄两领客使并滋三》《出云州书情寄两敕使》以及《和坂领客对月思乡之作》,释仁贞有《七日禁中陪宴》传世。当王孝廉逝于归途的噩耗传到日本,空海有《致渤海使王太守室》云:“凶变无常,承东鳞一沉,双凫只飞,惟哀痛深,痛当奈何!贤室年华未秋,奄遭此风霜,二三幼稚,偏露谁怙。痛哉哀哉。”^[7]空海另有七言残诗《伤渤海国大使王孝廉中途物故》,表现深切的悼念之情。大玄锡继位之后,政堂省左允杨成规大使聘日,日本文士都良香有《谢渤海杨大使赠貂裘麝香暗摸靴状》《赠渤海杨大使状》和《答渤海杨大使状》等3篇文章记载与杨大使的交往。裴氏父子与日本诗人交游密切,日本古籍中保存的渤、日通聘赠答汉诗中,有近三分之二的作品是与裴頌和裴璆的酬赠之作。

二、芳春赠答,夜月相思——渤海国使节诗歌主题论

渤海国使节与日本文臣的诗歌唱和加深了两国之间的文化认同和外交情感。作为带有外交使命的诗歌,这类作品如同带着镣铐舞蹈,它的主题以官方赐宴之时的颂圣宴饮,私人交往中的咏物酬赠以及渤海国使节的异国乡思为主。

渤海使节在宴会上即席赋诗,显示出敏捷的才思。诗歌主题以歌颂天皇德行和远客宴游之乐为主,具有雍容典雅的风度。渤海国朱雀三年,日本弘仁六年正月初七,日本天皇设宴款待渤海国使节,王孝廉有《奉敕陪内宴》,诗云:“海国来朝自远方,百年一醉谒天裳。日宫座外何攸见,五色云飞万岁光。”^[8]此诗的结构和文辞深受唐诗影响,以政治应酬为主,赞美日本天皇的德治。诗人从两国关系出发,以“海国来朝”的盛事入题,拉近双方情感。“天裳”“云”“光”皆用于称颂日本嵯峨天皇。全诗以景物描写为表,以颂圣应制为里,较好地展现了渤海国大使的才华。释仁贞有《七日禁中陪宴》,诗云:“入朝贵国惭下客,七日承恩作上宾。更见风声无妓态,风流变动一园春。”^[9]诗歌以“下客”“上宾”表现自谦与礼敬,以“风声”和“一园春”点明颂圣主题,以诗意的语言展示政治态度。

渤、日诗人受唐诗酬赠风气的影响,以诗歌相互品题,且在诗题中屡次提及对方姓氏官职,体现出对于才华和名誉的重视。这种诗歌命名方式赋予了渤、日赠答诗以历史文献价值,为渤海国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渤海国大兴二十二年(759),日本天平宝字三年,杨泰师一行完成了聘日使命,临别之际,日本文臣在田村宅第里为其设宴送行。在这次宴会上,杨泰师有五律《奉和纪朝臣

公咏雪诗》，诗云：“昨夜龙云上，今朝鹤雪新。只看花发树，不听鸟惊春。回影疑神女，高歌似郢人。幽兰难可继，更欲效而颦。”^[10]杨泰师的奉和咏雪之作扣住奉和之意，在咏物之时“将自身站立在旁边”^[11]，清醒地把握身份和态度，展现出良好的文化修养。

王孝廉与日本诗人赋诗赠答，巨势识人有《春日钱野柱史奉使存问渤海客》、坂上今继有《和渤海大使见寄之作》、滋野贞主有《春夜宿鸿胪简渤海入朝王大使》、都腹赤有《和渤海和覬副使公赐对龙颜之作》等诗歌与之酬赠。王孝廉的《春日对雨得情字》云：“主人开宴在边厅，客醉如泥等上京。疑是雨师知圣意，甘滋芳润洒羁情。”^[12]诗人得“情”字韵以春雨为题，“边厅”是远离京城的地方官厅，“主人”即主人滋野贞主。“上京”遥指渤海国都城。大使在诗中表达宾至如归，酣然如醉的感受，以雨师留客为名赞美春雨，点明送别之意，引出思乡之情。他的《在边亭赋得山花戏寄两领客使并滋三》则是以花寄情之作，云：“芳树春花色甚明，初开似笑听无声。主人每日专攀尽，残片何时赠客情。”^[13]负责接待渤海国使团的领客使以及著名诗人滋野贞主与王孝廉诗歌赠答，以“戏寄”名篇，可见私交深厚。他的七绝《出云州书情寄两敕使》云：“南风海路连归思，北雁长天引旅情。赖有锵锵双凤伴，莫愁多日住边亭。”^[14]这是诗人归国之际的赠别之作，日本领客使坂上今继有《和渤海大使见寄之作》相和，诗云：“宾亭寂寞对青溪，处处登临旅念凄。万里云边辞国远，三春烟里望乡迷。长天去雁催归思，幽谷来莺助客啼。一面相逢如旧识，交情自与古人齐。”^[15]诗歌以“宾亭”点明地点，与王诗中的“边亭”遥相呼应，引出羁旅之思。“万里”句从空间上点明大使远渡日本之艰辛，“三春”句从时间上唤起春日乡关之思，与王诗中的“海路”“归思”相互映衬。诗中的“长天去雁”和“幽谷来莺”进一步烘托怀乡之情，与王诗中的“北雁”“双凤”互相生发，尾联则申明两位文臣一见如故的情谊。两首应和之作都善于调动与送别、乡思有关的意象，唤起了时间和空间的想象，景与情的衔接自然流畅。

渤海国僧人释贞素有《哭日本国内供奉大德灵仙和尚诗并序》，云：

起余者谓之应公矣。公作而习之，随师至浮桑，小而大之，介立见乎缙林。余之身期降物，负笈来宗霸业。元和八年穷秋之景，逆旅相逢。一言道合，论之以心素，至于周恤小子，非其可乎。居诸未几，早向鹄原，鹤鹤之至，足痛乃心。此仙大师是我应公之师父也。妙理允契，示于元元。长庆二年，入宗五台。每以身厌青痴之器，不将心听白猿之啼。长庆五年，日本大王远赐百金，达至长安。小子转领金书，送到铁懃。仙大师领金讫，将一万粒舍利、新经两部、造敕五通等，嘱附小子，请到日本答谢国恩。小子便许。一诺之言，奚惮万里重波，得遂钟元外缘，期乎远大。临回之日，又谢百金。以大和二年四月七日却到灵境寺求访。仙大师已□（疑为亡字）来日久。位（疑为泣字）我之血，崩我之痛。便泛四重溟渤，视死若归，连五同行李如食之顷者，则应公之原交所致焉。吾信始而复终，愿灵凡兮表悉。空留涧水鸣咽

千秋之声，仍以云松惆怅万里之行。四月萸落如一，首途望京之耳。

不体尘心泪自涓，情因法眼奄幽泉。明朝恍问沧波客，的说遗鞋白足还。^[16]

诗前的长序介绍了渤海国僧人释贞素与日本高僧灵仙的师生情谊。作为僧人，他以佛家心眼和词汇表达痛苦和伤悼之情，“尘心”即凡俗名利之心，“法眼”即照见一切法门的洞察力，二者相对，表达对灵仙的赞美和伤悼之意。

在渤海国使节诗人中，裴頔和裴璆父子的声名与其作品存录情况形成了巨大反差，成为渤海国文学史上的一桩悬案。日本诗集中保存的日本诗人与裴頔唱和的诗歌共有26首，其中都良香2首，岛田忠臣7首，菅原道真17首存世。裴頔第二次出访日本给宇多天皇留有极好的印象，他令纪长谷雄代笔，书有《代宇多天皇遗前渤海大使裴頔书》。裴頔的风度和才华令日本天皇和大臣倾倒，他的儿子裴璆子承父业，青出于蓝。日本《本朝文萃》收录纪有昌的《送裴大使璆归国诗序》，云：“昔尼父之去周，老聃所以赠言；子高之还鲁，季节由其揽涕。况乎天涯绝迹，云帆长归。驰驿于烟驿，则梯山之程难计；通梦于波邨，则航溟之路易迷。”^[17]作为渤海国晚期的著名诗人和文臣，裴氏父子在日本文坛备受推重。

渤海国使节通过月色的描摹抒发怀乡之情。杨泰师的《夜听捣衣诗》是渤海国传世诗歌中唯一的七言歌行，以夜月砧声起兴，诗云：“霜天月照夜河明，客子思归别有情。仄坐长霄愁欲死，忽闻邻女捣衣声。声来断续因风至，夜久星低无暂止。自从别国不相闻，今在他乡听相似。不知彩杵重将轻，不悉青砧平不平。遥怜体弱多香汗，预识更深劳玉腕。为当欲救客衣单，为复先愁闺阁寒。虽忘容仪难可问，不知遥意怨无端。寄异土兮无新识，相同心兮长叹息。此时独自闻中闻，此夜谁知明眸缩。忆忆兮心已悬，重闻兮不可穿。即将因梦寻声去，只为愁多不得眠。”^[18]结合《续日本纪》记载和诗歌中对于季节的表现，这首诗应作于渤海国大兴二十一年的秋天。彼时的杨泰师作为副使访日，到达日本后因受安史之乱的影响，日本官方将他们安置在越前等候天皇召见，直至第二年方得以进入京都。留滞越前之时，秋夜砧声勾起了诗人的怀乡之情，诗情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王孝廉《和坂领客对月思乡之作》亦是咏月思乡之作，这是其传世诗作中唯一的五律，诗云：“寂寂朱明夜，团团白月轮。几山明影彻，万象水天新。弃妾看生怅，羁情对动神。谁云千里隔，能照两乡人。”^[19]此诗是诗人与领客使坂上今雄的唱和之作，前四句以写景为主，以“寂寂”形容静夜，以“团团”形容明月，衬之以山光水色，营造出宁静澄澈的意境，凸显了诗人笔下的静净的月夜神韵。后四句以抒情为主，由明静之月色勾起了浓浓的思乡怀人之情。诗人以一轮明月千里寄情，排解相思，达观的心境与明净的月色融为一体，展现出隽永的意境。

三、清新典雅，唐诗苗裔——渤海国使节诗歌艺术论

渤海国使节诗歌不见人间烟火的亲切，不见沙场干戈的豪迈，不见山水风光的写意，不见怀才不遇的怨旨。它是异国情境下的交际文学，不仅题材受到限

制,艺术上也具有应制诗歌和酬赠诗歌的共性,具有抒情委婉,句典妥帖以及声情和谐的艺术特征。

渤海国聘日使节诗歌具有功能性,它以赠答诗歌来点缀政治行为,获取外交好感。这类诗作多以委婉圆融的方式表情达意。杨泰师《奉和纪朝臣公咏雪诗》在起承转合之间体现出优美舒展的姿态和流转自如的技巧,以“龙云”“鹤雪”兴起,既表现了云的灵动和雪的洁净,又点缀了升平的气象,暗合颂圣之意。他的《夜听捣衣歌》则以霜天夜月和捣衣砧声兴起客子思归之情,“霜天”点明了秋末冬初的时节,“月照”则将诗歌的空间进行了拓展,由一轮明月将两乡之人联系在一起。诗歌的情感线索依照触景伤情、遥怜邻女到自咏怀抱,经历了由现实到想象,再回归现实的跌宕变化,与白居易的《琵琶行》颇有相通之处。整首古诗收放自如,灵动而不失规矩。另外,王孝廉的《春日对雨得情字》以“疑是雨师知圣意,甘滋芳润洒羁情”兼顾颂圣之意和赠别之情。渤海国聘日使节诗歌保持了温柔敦厚的教养,以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和委婉圆融的表达来实现外交目的。

渤海国存世诗歌的几处用典都能做到恰切妥帖,这与聘日使节诗歌的创作语境和艺术追求密切相关。渤海国使节的诗歌是外交活动的组成部分,诗歌用典以工稳和典雅为美,创作中将自身的情感表现得较为潜隐。同时,这类诗歌多数选入《文华秀丽集》,这部汉诗集的审美取向使得入选的渤海国诗歌在用典上有着含蓄优美的共同特征。杨泰师《奉和纪朝臣公咏雪诗》以花比雪,深谙咏物诗歌不即不离之道,扣住雪与花之间的相似性,又能在以花喻雪之外进一步生发。岑参以春风吹绽千万梨花形容胡地雪景的壮阔绵密,杨泰师则沿着花与雪之联系展开了联想,由花及鸟,通过“不听鸟惊春”和“只看花发树”的虚实相生,烘托日本雪景之飘逸清静的神韵。后四句由景及人,以郢人“阳春白雪”之典来赞美友人的风度和才华,以东施效颦自谦,诗思老练而自然。他的《夜听捣衣歌》的主题和形式深受李白《捣衣篇》的影响,而语言和情感表现上又带有杜诗的印记,可谓以李诗为形,杜诗为神,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展现了渤海国诗歌与唐诗的亲缘关系,显示了杨泰师的艺术功力。

王孝廉《在边亭赋得山花戏寄两领客使并滋三》深谙唐人绝句之法,遗貌取神,以美人笑颜状初花绽蕾之妍丽,以听声之痴态状赏爱之情绪,用比拟和通感的修辞手法营造出静美的物境与心境。诗中既有折柳赠别的心思,亦有折梅寄情的情韵,不离赠别怀乡之旨。《和坂领客对月思乡之作》中“弃妾看生怅,羁情对动神”一联有杜甫《鄜州望月》“双照泪痕干”之意旨,“谁云千里隔,能照两乡人”一联又有李白《静夜思》的韵味。渤海国聘日使节传世的诗歌多为短篇律绝,用典较少,对于前人句意的化句则以唐诗中表现思乡怀人和自然花月的内容为主。

这类诗歌的声韵以流畅和谐为特征,杨泰师《奉和纪朝臣公咏雪诗》以平声“真”韵一韵到底,而《夜听捣衣歌》的声情表现则复杂许多。诗歌于七言中夹杂六言句式,参差错落的形式使得诗歌在古朴中生出了摇曳的动感,将旅人的愁思

和使节的焦虑富有层次地表现出来,情感浓郁而丰富。诗歌十二韵,两句一转韵,分别用“庚”“纸”“翰”“寒”“职”“屋”“先”等韵目。诗歌韵律具有活泼性和生命力,以“庚”韵牵引,以“纸”强化,以“职”“屋”两韵抒发感怀,以“先”韵留下袅袅的余响。流转顿挫的韵律与苍凉细腻的情感配合得天衣无缝。王孝廉的《奉敕陪内宴》以工整和谐的形式取胜,体现出王孝廉对于近体诗法和应制诗歌的精准把握。诗为“阳”韵,具有响亮流转的韵律,与应制颂圣的主题巧妙配合。《春日对雨得情字》“情”字韵一韵到底,《和坂领客对月思乡之作》则以平声“真”韵一韵到底。《出云州书情寄两敕使》的声韵形式较为复杂,诗人以平声“庚”韵和邻韵“青”字借韵,尤其是一、二两句的平仄安排较为巧妙。

四、结 语

黄维翰《渤海国志》称:“夫劲悍喜战斗,固鞅鞶本性,而能范之以礼,陶之以乐,泽之以诗书,使举国成为风俗,高武文宣诸王贻谋远矣。”^[20]渤海国聘日使节诗歌中的奉和酬赠之作,带有雍容平稳的程式化特征,虽然缺少真正的性格和情怀,但是它的外交功用和艺术技巧仍然值得深入研究。这类诗歌作为外交活动的一部分,彰显了渤海国的文化品位,记录了渤、日通聘中的重要场景和历史画面,具有文学和文献的双重价值。

渤海国诗歌建立在对唐诗的学习和模仿之上,缺少独立性和创造力。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渤海史考》分析渤海国文化消亡原因,指出:“就渤海文化之兴废言之,其国家组织一破,其文化亦即消亡,似甚可怪,其实不然。生物之心的组织,亦与生理的法则同,脑之细胞停止作用时,其几多岁月筑成的精神建筑物,亦必失其作用之机会,而忽陷于消灭。加以渤海王国文化之中心本限于上流,不能彻底于下层,且其文化性质,只表面模仿唐人文化,国民自觉上本无根据,故其核心之贵族社会既与国家组织同亡,则渤海之灿然文化,失其形迹,固当然也。”^[21]文化的化育和涵养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渤海国的诗歌虽然散佚,但是它的精神和气韵却由渤海遗裔继承和延续,涌现出众多渤海遗裔诗人,在辽、金文学中大放异彩。

注释:

- [1]傅璇琮、许逸民主编:《中国诗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63页。
 [2][4]曹顺庆主编:《东方文论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69、666页。
 [3]曹丕:《曹丕集校注》,夏传才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33页。
 [5][6][7][8][9][10][12][13][14][15][16][17][18][19]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年,第376、206、444、429、430、429、429、429、432、430、443、428、429页。
 [11][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930页。
 [20]黄维翰:《渤海国记》,辽沈书社,1985年,第143页。
 [21][日]津田左右吉:《渤海史考》,陈清泉译,商务印书馆,1970年,第112页。

[责任编辑:黎虹]